

马 强 池子华 主编

红十字在上海， 1904 — 1949

上海市红十字会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 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马 强 池子华 主编

红十字在上海， 1904—1949

上海市红十字会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马强 池子华主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11

ISBN 978-7-5473-0729-8

I. ①红… II. ①马… ②池… III. ①红十字会-历史-上海市-1904—1949 IV. ①D693.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6680 号

本书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出版资助项目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431 千

印 张:25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29-8

定 价:8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编委会

单 位

上海市红十字会 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

主 编

马 强 池子华

副主编

李明磊 张 钢 孙大红 丁泽丽

编 委

李江英 杨钧仪 滕桂香 周湘兰

张 瑾 刘贵朝 崔月芳 郭进萍

徐 璐 袁 玲

前言

上海,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祥地。1904年3月10日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诞生。上海长期是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所在地。上海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的试验场、传播红十字文化的集散地、全国红十字运动的中心。而1911年诞生的沪城分会(上海市红十字会的前身)会同上海地区的其他分会,均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直接领导下的地方分会,给予中国红十字会及驻沪总办事处以有力的配合、支持,沪城分会逐渐成为上海区域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领头羊”。毫无疑问,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生、发展,是与“上海”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是,长期以来,上海红十字运动的系统研究,成果寥寥,这与上海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独特地位极不相称。

2011年12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在出席上海市红十字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时指出:“上海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诞生地,在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红十字会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坚持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兴会,充分发挥作为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助手的作用,积极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希望上海红十字会“深化理论研究,充分挖掘红十字文化内涵,广泛传播人道理念,更好地推动中国红十字事业的长远发展”。华会长的讲话,在肯定上海红十字运动的地位的同时,也提出“深化理论研究”、繁荣红十字文化事业、提升“软实力”的殷切希望。有鉴于此,上海市红十字会与苏州大学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精诚合作,开展了《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课题研究。经过合作双方近三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在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10周年之际付梓。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不仅仅着眼于上海市红十字会的研究,而是包括了中国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组织以及赤十字会等在内的几

乎所有在上海区域范围活动的红十字组织、类红十字组织及其重要人物、历史事件等;“上海”的区域范围,也不仅仅限定在20世纪初的上海城区,而是包括了目前上海市的管辖范围(17个区县)。通过这样的研究视角,我们希冀尽可能全面再现近代中国红十字运动的背景、起源、过程和红十字运动在上海地区的多元与多样性,揭示上海市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

本课题是在分工合作基础上完成的,其中第一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由郭进萍承担;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及尾声,由池子华承担;第六章、第七章第一、二、三节由袁玲承担;第七章第四节由代华承担;第八章由池子华、曹金国承担;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由丁泽丽承担;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由徐璐承担;大事年表由课题组共同分担。全书由马强、池子华修改、统稿、定稿,上海市红十字会有关工作人员给予协助。

要说明的是,上海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内容丰富,背景深厚,绝不是吾辈及本书所能见其全貌,只能略窥豹斑,弥补缺憾,为尔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一些基础。因此,不全、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业界、学界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也吸收了学人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前言 / 001

第一章 红十字在上海“登陆” / 001

第一节 上海——红十字文化进入中国的“窗口” / 003

第二节 红十字文化在上海的发酵、融合与传播 / 008

第三节 红十字文化中国化在上海的早期实践 / 014

第二章 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与上海 / 019

第一节 日俄战争与沈敦和等人的建会活动 / 021

第二节 中“西”合作，沈李联手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组建 / 028

第三节 救援，在上海与东北之间 / 034

第三章 草创之初的中国红十字事业 / 041

第一节 从合办到自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转型 / 043

第二节 创办红十字医院与学堂 / 048

第三节 从中国红十字会到大清红十字会 ——首任会长盛宣怀的易名之举 / 052

第四章 上海：辛亥革命期间人道救援的枢纽 / 057

第一节 沈敦和在上海组建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 / 059

第二节 以上海为枢纽的人道救援行动 / 064

第三节 中国红十字会与赤十字会 ——张竹君、沈敦和上海“龙虎斗”探源 / 070

第四节 上海“光复”与夏绍庭、殷锡璋组建沪城分会 / 075

第五章 民国肇建与红十字会的再次转型 / 083

- 第一节 “立案”完成身份上的转变 / 085
- 第二节 参与国际事务首次“亮相”国际舞台 / 088
- 第三节 民国首届会员大会确立新的运行机制 / 091
- 第四节 建章立制,初探规范化管理 / 095

第六章 “癸丑之役”中的人道救援 / 101

- 第一节 上海:人道救援的指挥机关 / 103
- 第二节 沪城分会之救援 / 110
- 第三节 “大通”:驶出上海的希望之船 / 113

第七章 “二次革命”后的上海红十字运动 / 121

- 第一节 红十字会会务的开展 / 123
- 第二节 战地救护与灾害救济 / 131
- 第三节 医疗卫生救助和社会服务救助 / 139
- 第四节 日本关东大地震与红十字会的国际救援 / 150

第八章 江浙战争与上海红十字运动的高涨 / 159

- 第一节 江浙战争与上海红十字组织体系的建构 / 161
- 第二节 上海红十字组织的第一次江浙战争救护 / 165
- 第三节 上海红十字组织的第二次江浙战争救护 / 173
- 第四节 江浙战争救护成功的原因 / 175
- 第五节 江浙战争救护与上海红十字事业发展 / 178

第九章 上海特别市设立前后的红十字组织 / 183

- 第一节 “北伐战争”救护与上海“彻查”风波 / 185
- 第二节 上海总办事处的“抗争”与“适应” / 192
- 第三节 雪中送炭 情暖人间 / 200

第十章 抗战前期的救护行动 / 209

- 第一节 “一·二八事变”与沪战救护 / 211
- 第二节 组织协调华北救护 / 217
- 第三节 上海:绥远抗战的后盾 / 221

第十一章 “淞沪会战”爆发前的调整与准备 / 227

第一节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杜月笙亮相红十字会 / 229

第二节 “时代之需要”：征求会员运动 / 236

第三节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在上海组建 / 242

第十二章 “淞沪会战”与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 / 249

第一节 “七七事变”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重组 / 251

第二节 “淞沪会战”中的救护队、急救队与战地救护 / 255

第三节 “淞沪会战”中的救护医院与特约医院 / 263

第四节 不朽的丰碑

——苏克己、谢惠贤、刘中武、陈秀芳殉难罗店 / 270

第五节 “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 / 274

第十三章 “战争中的人道”与创新 / 281

第一节 上海沦陷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建立 / 283

第二节 难民救助工作与饶家驹(南市)难民区 / 291

第三节 医疗卫生救助服务 / 298

第十四章 复员时期的上海红十字运动 / 303

第一节 红十字会工作重心的转移 / 305

第二节 招募运动的开展 / 307

第三节 会务工作中的“上海特色” / 312

第四节 众望所归盼“改组” / 323

第十五章 上海：红十字文化在上海的荟萃 / 327

第一节 红十字刊物 / 329

第二节 红十字文化艺术活动 / 333

第三节 宝塔捐——富有特色的募捐 / 336

第四节 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 / 340

尾声 在历史回望中走向未来 / 345

附录一 大事年表 / 353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 383

第一章

红十字在上海“登陆”

国际红十字运动兴起后,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作为 19 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果,红十字漂洋过海并“登陆”中国上海,由此开启了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大幕。

第一节 上海——红十字文化 进入中国的“窗口”

1859 年 6 月 25 日,31 岁的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在意大利商业旅行途中,在索尔费里诺地区目睹了法、奥两军殊死搏斗后,战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情景,他设法说服法军将领,并组织军队中的医护人员和村民志愿为伤兵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救助、战地救护。在此过程中,亨利·杜南萌发了建立伤兵救护组织,减少战争中兵民的伤残和痛苦的构想,“人性和文明急切呼唤着成立这样的伤兵救护组织”。^①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协会将号召每一个人以真诚的博爱精神,全身心地投入战时的慈善工作中去”^②,实施有效的救护。战地救护工作结束后,杜南开始撰写《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回忆录不仅通过对那场血淋淋的屠杀细节的真实描写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还提出了建立一个组织——伤兵救护协会,签署一个国际公约来保护伤病救护组织在战场上的人道行动安全。书中呼吁“以批准一项不可侵犯的公约的形式来确立一些国际准则,一旦公约得到同意和批准,就可以成为欧洲各国伤兵救护协会成立的依据”^③,从而保障人道主义的实施。

在杜南的奔走呼吁下,1863 年 2 月 9 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 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成立,标志红十字会的诞生。1864 年 8 月 8 日至 22 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有 12 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署了《1864 年 8 月 22 日改善战地陆军伤



亨利·杜南

① 亨利·杜南:《索尔费里诺回忆录》(杨小宏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2009 年版,第 87 页。

② 同前,第 82 页。

③ 同前,第 86 页。

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了红十字特殊的中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公约的签署，如杜南所称，是“伟大的外交创举，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新的战旗”。^①由此红十字运动在西方蓬勃发展起来，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红十字文化也如燎原之火迅速传播开来。而中国，在门户洞开、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下，红十字的“准入”也是大势所趋。

1863年国际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仅仅过了11年，1874年红十字的理念就开始在上海传播。其时，日本在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9月，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发了一篇大力宣传介绍当时救治战争伤病的红十字会的文章。^②上海《申报》翻译成中文，加以转载、评论，称“亚细亚诸国之从事于战阵也，以戮杀俘囚为常，故驻扎东洋及中国之各泰西钦使每存仁义之见，应协力向两国商议，务须舍弃旧习，两面定义战败之俘囚不献馘，被虏之伤疾不加害。且于（开）战后不分彼此，两造所有创伤者，均令设法调治焉”。并希望中国能仿照办理：“今我国何不亦召好善者，以效作此善举乎？然欲兴此举，须两面商妥，且约束诸兵，使不纵悍心猛气，而杀害局外善济之人。”^③不过两报的讨论都没有直接提“红十字”这三字。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知道“红十字”究竟是什么。

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梅威令医生在台湾设立医学堂，除日常施医救病外，还专门培养战时可资应用的红十字医疗救护人员。上海《申报》颇为关注，对此作了跟踪报道，相继刊载《译西报述考试医学事书后》、《颁给凭据》、《述台湾打狗慕德医院办理原由》、《述台湾打狗慕德医院学生考试情形》、《论西医将行于中国》、《论梅威令医生教习之认真》、《书本报领凭志盛事后》和《医国篇》等文章^④，对梅威令医生的红十字人才培养善举及在上海的试演情况详尽介绍，使国人对西方以救护战争伤病为职志的红十字组织有了一个懵懂的认识。1888年，梅威令带领一些学有所成的西医学生专程到上海举行救护演习，“其人腰佩利刀，左手持红十字小旗，肩荷药笼医具，衣袖亦以红十字为记号，出入于白草黄沙之内，施其妙技，井井有条”。^⑤这是目前所见史书记载的第一场救护演习，而当时的上海道龚煦璠对梅威令的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不但当众鸣谢，而且次日特往梅医生处踵谢以宠之”，《申报》据

①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② 周秋光、靳环宇：《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光明日报》2006年3月3日。

③ 《交战时宜预筹保护人命》，《申报》1874年9月7日。

④ 见《申报》1887年7月21、24、28、29日，9月14日，1888年7月28日、8月7日、9月29日。

⑤ 颉生：《创兴红十字会说》，池子华、严晓风、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此评论道：“盖中国之有西医自此而始，故视之若不胜郑重也。”^①

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爆发，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在华西人肩负起了筹办红十字医院的重任，积极参与伤病兵救治工作。上海《申报》对营口、烟台等红十字医院的成立、医治情况及国人捐助红十字会医院的善举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当时《申报》这样描述红十字会：“教会中有所谓红十字会者，其人专习医伤之技，每逢战阵，衣袖上缀红色十字之，衣腋下悬利刀，提药笼而出。见有中弹中刃者，舁归药室，敷以刀圭，又有舍身妇人悉心奉侍，称药量水，劳瘁不辞。此等人出自善心并不受国家诏糈，故无论敌人与本营卒伍，但见伤者，即舁归医之。敌人亦敬其为善会中人，任其出入于枪林弹雨中，不准有人加害”^②；“闻之泰西教中人创行红十字会，择医士之技能出众者，制备医伤诸药，约集同志，身衣袖上缀红色十字之衣，亲赴战场为两国受伤人悉心敷治，不分畛域，一视同仁。”^③又载：“红十字会者，皆各国好善之士或精于医术者纠集同志制备刀箝，药饵之□，随营前进，遇受伤者则医之。其人装束略如武员，腰佩长刀，手执小方旗，旗上画一红十字，衣之右袖亦如之。背负小药箱出入于枪林炮雨中，人见其为行善之人，不之禁阻，一有兵士中弹而仆，即舁归施救，敷以妙药，饮以美酒维持调护，备极周详。”^④如此等等，使远离战地的人们透过《申报》等媒介的报道，了解红十字会救伤的情形。

上海虽然不是战地，但无疑是红十字会后援保障的中心。为确保红十字医院救治伤兵所需的医药、绷带等材料的后续供应，传教士等外国人士致函上海教士慕维廉，请代募善款。“本由西国善士及病船上医生陆续舁归医治，兹以医药资不敷，行将中止，特函请沪上大牧师慕维廉先生出内，惟此款自应多多益善。”^⑤为此，上海地方的外国人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⑥，用于筹募捐款，协助红十字医院的工作。人员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主等组成，负责向营口、烟台的红会医院提供款项。^⑦据《甲午战时辽居忆录》载，上海红十字会将“一千五百两白银（约240英镑——引者）运到了奉天医院”。^⑧

① 《书本报领凭志盛事后》，《申报》1888年8月7日。

② 《行军以医生为要》，《申报》1894年12月19日。

③ 《论侨奴残暴》，《申报》1894年12月5日。

④ 《劝助行营医院经费说》，《申报》1895年2月10日。

⑤ 《募捐小引》，《申报》1895年2月7日。

⑥ 关于甲午战时上海成立红十字会的说法，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有学者认为：“上海成立的红十字会是一种误解。1895年初，由于营口红十字医院药品不足，曾向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求援，请其代为在上海募捐，申报馆也参与此事。”见[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英]伊泽·英格利斯编：《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信丹娜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⑦ 《劝募医伤经费》，《申报》1895年3月9日。

⑧ 戚其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6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5页。

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时红十字会医院的经费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上海绅商所主持的民间筹资渠道,以《申报》馆协赈所和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公开劝募为代表。他们借助《申报》大张旗鼓地为西人所办的红十字医院募捐,激起民众高昂的赞助热情,同时对西方的红十字组织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综计1895年《申报》馆协赈所所收赈款“一、解红十字会英洋四千五百元;一、解红十字会规元一千两”。^①据靳环宇统计,1895年2月至3月间,《申报》所载《申报》馆与仁济善堂、丝业会馆经收红十字会医院经费捐户达220户以上,地域遍布国内外,计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直隶、山西等地,而以江浙一带最为集中。并且,国内捐户中也有外国人士捐款。捐户涵盖面也很广泛,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官员,但更多是各地的绅商,另外,闺阁中人、方外人士也有乐捐者。^②这种积极地响应反映了国人对红十字会这种新生组织的认可和支持。据笔者粗略统计,1894至1895年间《申报》登载与红十字相关的文章多达76篇,仅1895年即有74篇之多。这些报道无疑“使国人从直接的‘观摩’中受到刺激与启发,认识到红十字在战争救护中的重要性和弥补这一‘缺陷’的必要性、紧迫性。这样,以甲午战争为嚆矢,中国红十字的启蒙运动开始兴起”^③,并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辐射。

那么上海何以会成为红十字进入中国的“窗口”?这与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缘因素密不可分。

其一,上海是首批开放的商埠城市。上海对外开放后,得益于“江海要津”的特殊地位而迅速崛起,很快形成全国对外贸易、工商、金融、传播西方文化的中心。^④“财富可以转化为仁慈的德行。”经济的发达,也带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缙绅名流,硕腹巨贾,车马辐辏,靡不毕集,而善举亦惟是为最多,善量为最大,筹赈鬻恤,各省靡不挹注。是以警报传来,他处往往遇险,而歇浦一隅,祥云拥护,赖诸大仁长幹旋之力,盘石长安,独以造地方无穷之福,而为吴中乐土。”^⑤

其二,上海也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西学,无论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抑或文化层面,总是首先在上海找到生长点。”^⑥上海不仅新式教育发展迅速,而且是

① 《综计乙未年本馆协赈所筹赈事略》,《申报》1896年2月25日。

② 见靳环宇:《晚清义赈组织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190页。

③ 池子华、郝如一:《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④ 池子华:《中国近代社会史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⑤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⑥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汇聚点,成为“西学东渐”的桥梁。^①作为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上海具有其他城市难以企及的发达的传播业和西方先进文化的巨大承载力,为新式慈善理念的传播和消化吸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红十字“最先在上海登陆,并以上海几大报《申报》、《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为媒介,走近上海民众,进而向全国扩散。毫无疑问,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人对红十字的了解远过他处,这是中国红十字会首先在上海发端的民众和社会心理基础”。^②

其三,上海具有浓郁的慈善文化传统。江南好善之风盛行,在上海体现得尤为明显。《法华乡志》载:“富人率皆好善,遇便人事争先为之,故事易集。今虽户鲜盖藏,而尚义之风较他处尤为奋勉。”^③乡镇之中也多乐善好施、见义勇为之风,如宝山月浦,据史料载称:“月浦地瘠民贫而乐善好施者则亦不鲜,往往慷慨解囊,集涓滴而成巨款,存典生息,资以施济,俾茕茕无告之民以及无主尸身皆得其所。呜呼,其有上古仁厚之遗风乎?”^④上海民间慈善活动发达,当时的人就注意到了。冯桂芬提出:“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惟苏州、上海为备。虽都会如江宁,膏腴如扬州,弗逮也。”^⑤至近代,伴随上海的开放和崛起,各类善行义举的开办更是独占鳌头。《申报》对上海善堂林立的情况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诸如“上海善堂林立,凡贫苦者之生养死葬,莫不妥酌章程,悉心经理。是众善之门,当称无美不具矣”^⑥、“上海一隅之地善堂林立,饥者食之,寒者衣之,病者诊之,死者葬之。或惜字以延年,或放生而戒杀,万善同归,无微不至,法良意美矣”^⑦、上海“善堂林立,甲于他邑,而资斧亦皆充足”^⑧、“上海善堂林立,义举极多。凡各处灾歉,罔不仰给焉。他如恤嫠、保婴、施医、施棺等善举,无不具备”^⑨之类的记载不胜枚举。可以说,上海民间慈善活动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伴随义赈活动的兴起,上海由于浓郁的慈善文化传统和雄厚的财富支撑使得“上海不仅是义赈最初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很快成为整个义赈活动的中心地”。^⑩义

① 池子华:《中国近代社会史论》,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②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③ 《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1,第1册《法华乡志》卷二《风俗》,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页(总第27页)。

④ 《月浦里志》卷十《救恤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0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⑤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九辑,冯桂芬著:《显志堂稿》(卷一—卷五)卷三《上海果育堂记》,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30页。

⑥ 《论善堂义冢切宜深埋事》,《申报》1872年7月15日。

⑦ 《拟请各善堂将收捐少年改用老者》,《申报》1874年2月4日。

⑧ 《论善堂新闻》,《申报》1874年2月5日。

⑨ 《便贫民即所以化莠民说》,《申报》1882年12月8日。

⑩ 朱浒:《中国红十字会的地方性起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地方性慈善事业,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义赈是“民间的救灾行为,超越了地域的界线和区隔,贯穿于从‘捐赈’到‘放赈’的全过程,并且是自己管理,自我约束,独立于政府管理体系”。^① 这为红十字人道主义文化进入上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总之,上海成为红十字文化进入中国的“窗口”,不是偶然的,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交叉互动的产物,有着历史必然性。

第二节 红十字文化在上海的 发酵、融合与传播

上海开风气之先,成为红十字进入中国的“窗口”。但红十字文化要实现在中国的“着陆”,并非一帆风顺。诚如池子华所说:“没有启蒙宣传而欲使红十字博爱之光‘照耀于中国二十一行省’,不啻为梦呓。舆论先导,这是红十字走近中国的先决条件。”^② 早期红十字文化的传播即是依托上海而展开的。其中,以报纸杂志为主体的近代媒介对红十字文化的宣传与介绍功不可没。它们对红十字事业一开始的关注或许仅仅是因为其“足以新人听闻”,但其后连篇累牍的报道却在客观上推动了红十字文化的在华传播。

在晚清各类报纸杂志中,对红十字关注较早且报道较系统的当属《申报》。诞生于1872年的《申报》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包罗万象,“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③ 红十字在上海的登陆即归功于《申报》的报道,其后《申报》又从多角度对创办红十字会的必要性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和宣传。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申报》就尝试从民族主义角度倡导中国应仿行红十字组织。“今中国于行军之道事事效法泰西,而营中尚乏医生,致一旦两国交兵,则呻吟疾苦之声几致惨难入耳。岂非武备中一大缺陷哉!”希望当局积极培养西法之医,

① 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19世纪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②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③ 《申报》1872年创刊号。